

# 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田刚瑞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1日

## 摘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 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 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的融合日渐加深, 正在引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因此推动数字金融繁荣发展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将数字金融与外商直接投资深度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 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 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 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结论可为今后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外资引进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 关键词

数字金融, 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开放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angrui Tian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ch 8, 2026; accepted: March 18, 2026; published: May 21, 2026

##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intensified, lead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s one of the key engines dri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presents a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this study employs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fina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uture efforts to advance digital finance and optimize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 Keywords

Digital Finan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pening-Up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依托要素禀赋融入全球经济,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有效缓解了初期资本与技术短缺,助力经济增长。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加剧“逆全球化”,国际投资不确定性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涨,经济、产业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经济向质量型转型亟需新动力吸引高质量外资。

随着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发展,数字金融迅速崛起,突破传统金融模式,以数据驱动、智能风控为特征,深度绑定国民经济各层面并产生重要影响。宏观层面,数字金融可促进包容性增长[1]、提升区域创新[2]、优化产业结构[3],通过高效信息处理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风险;微观层面,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激励创新创业[4]、提升居民消费[5]、缩小收入差距[6],覆盖传统金融“长尾”客户[7]。作为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技术融合的产物,数字金融为金融数字化转型与现代金融体系构建提供重要支撑。

部分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对FDI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可促进城市FDI流入,东部地区效应更显著[8],人力资本与通信基建能强化该效果,且数字经济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间接吸引外资[9]。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组成,刘飞飞等验证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作用[10],相关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FDI有正向影响,但目前缺乏对其影响FDI机制与路径的系统性探讨。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及如何影响FDI、影响程度如何,亟需实证检验。探究二者关系可为金融与国际投资理论提供补充,对创新金融服务、拓展金融开放具有政策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采用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FDI流入的影响。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机制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普惠金融的创新形态与重要方向。普惠金融于2005年由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提出,核心是为所有社会阶层(尤其小微企业、偏远及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提供可获得、成本合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满足其多样化需求。“普惠”既强调金融服务的普遍性,降低准入门槛、扩大覆盖范围;也注重实惠性,确保服务价格合理可控,体现金融资

源公平分配。但传统金融体系面临“获客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难”等问题，导致普惠金融推进受阻、覆盖有限，金融排斥现象普遍，许多弱势群体因缺乏抵押物、信用记录不完整等难以获得金融支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服务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得以更高效、精准、低成本地触达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群体，数字普惠金融概念随之形成并受广泛关注。2016年，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明确其定义与框架，即“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目标实现的一切金融活动”，实现路径包括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创新服务。其核心是借助技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效率、控制风险，深化普惠金融实践效果，增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包容性，助力构建更公平、韧性的金融生态。

### 2.1.2.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指外国企业、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通过独资设立企业、与中方共同创办合资企业或其他合作形式，在我国境内进行的实质性资本投入和经济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几个重要阶段：初始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资引入处于摸索与起步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以规模扩张为重点的外资引进阶段，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

至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外商直接投资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该阶段引进外资的方式发生显著转变，逐渐摒弃了过去粗放式、重数量轻质量的做法，转而更加注重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创新推动能力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作用。

2012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外资来华投资的动机更加多元，包括市场寻求、资源整合与创新合作等，同时也面临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竞争加剧等新挑战。作为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键纽带，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持续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活力，还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11]。

## 2.2. 理论机制分析

跨国公司开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核心动机包括市场开拓、资源整合、效率优化[12]及知识技术外部获取[13]，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其效率寻求动机，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的金融环境与资源配置方式，提升资金运用效能。

数字金融包含两大维度：第三方数字科技企业的金融交易数字化支持，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二者共同推动金融业务智能化、高效化与普惠化。我国普惠金融推行以来虽有成效，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农村居民等长尾客户时，仍面临“获客难”(客户分散、需求小额高频)与“风控难”(缺乏财务记录、抵押物不足)的双重挑战[14]。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全新技术支撑，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构建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生态[15]：数字平台可助力金融机构积累终端客户资源，多维度行为数据能优化信用评价模型，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风险识别与违约预测能力。

这一过程显著完善了我国普惠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发展水平升级与现代化金融系统构建；而健全高效的金融系统能缓解跨国企业与东道国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还可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营商环境等增强区域外资吸引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对FDI流入具有促进作用。

### 3. 研究设计

#### 3.1.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数字金融发展对 FDI 的影响, 本文参考唐松等[16]的方法, 构建地区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_{it} +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FDI 为对外直接投资, DIG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ntrols_{it}$  为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合集,  $\mu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lambd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 3.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 具体为各省份年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衡量单位为亿美元); 为减轻异方差并使系数具有弹性含义, 分析时对其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表格中为原始数据, 不影响核心结论)。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发展(DIG), 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 2011~2023 年中国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选取: 经济发展规模(PGDP)、产业结构(IS)、金融发展水平(FIN)、政府干预(GOV)、人力资本水平(HR), 衡量方式不变。

本文以中国 2011~2023 年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 本文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样本数据), 实证过程中使用的 FDI、GDP、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sup>1</sup>以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17]。

#### 3.3.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外商直接投资均值为 0.020, 标准差为 0.020, 不同省份间差异较小; 数字普惠金融均值为 255.544, 标准差为 111.336, 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时已对 FDI 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以减轻异方差影响。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 符合回归要求。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Name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FDI	360	0.020	0.020	0.000	0.017	0.121
DIG	390	255.544	111.336	18.330	267.950	473.830
PGDP	390	10.903	0.470	9.682	10.867	12.207
FIN	390	3.484	1.102	1.690	3.240	8.160
IS	390	1.376	0.761	0.527	1.216	5.690
GOV	390	2.575	1.106	1.050	2.304	7.583
HR	390	9.329	0.913	7.470	9.240	12.780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为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不加控制变量, 列(2)添加控制变量, 数字金

<sup>1</sup><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融(DIG)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假说 1 得到验证[18]。对核心控制变量作用方向的合理性分析如下:经济发展规模(PGDP)系数显著为正,因地区经济水平越高,市场规模与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吸引外资;产业结构(IS)系数显著为负,源于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但高端服务业不足,传统服务业对外资吸引力弱,且第二产业占比短期下降的影响更突出;政府干预(GOV)系数显著为正,适度干预可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为外资提供稳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FIN)和人力资本水平(HR)系数不显著,可能因部分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低效、人力资本质量未达外资需求,未形成有效吸引力。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表 2.** 基准回归

	(1)	(2)
DIG	0.0003*** (2.7953)	0.0003*** (3.1195)
PGDP		0.0225*** (3.0964)
FIN		-0.0043 (-1.2613)
IS		-0.0214*** (-3.9210)
GOV		0.0231*** (5.6023)
HR		0.0070 (1.3480)
_cons	0.0143*** (3.0164)	-0.3071*** (-3.4276)
N	360	360
R <sup>2</sup>	0.0881	0.1873

####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分别通过缩尾处理、剔除直辖市、解释变量滞后一阶、剔除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时期进行检验,数字金融系数均显著为正。此外,补充系统 GMM 动态面板模型检验(解决可能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问题),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该结论稳健可靠。

#### 4.3. 异质性检验

如下表 4 所示,本研究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地区,然后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中部地区的数字金融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但系数小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系数为负数。其内在原因可简单论述为,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金融开放度高,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且与外资集中的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适配性强,赋能效应充分发挥,故促进作用最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数字金融逐步普及,

但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弱于东部，外资多投向传统制造业，数字金融赋能有限，因此系数小于东部但仍为正向；西部地区呈现负向效应，核心是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数字鸿沟明显，产业以资源型、传统产业为主与数字金融融合度低，且人才短缺、营商环境不完善引发资源错配，反而削弱了对外资的吸引力。补充 Chow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验证区域差异的统计显著性，结果显示东部与西部系数差异的 Chow 统计量为 4.82 (P 值 = 0.003)，中部与西部系数差异的 Chow 统计量为 3.56 (P 值 = 0.028)，均在 5% 水平下显著，而东部与中部系数差异的 Chow 统计量为 1.21 (P 值 = 0.273) 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东、中部之间仅为促进程度差异而非本质差异。

**Table 3.** Robust testing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缩尾处理	剔除直辖市	解释变量滞后一阶	剔除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时期
DIG	0.0003*** (3.1267)	0.0004*** (3.5735)	0.0003*** (2.9588)	0.0003*** (2.6105)
PGDP	0.0218*** (3.0278)	0.0123* (1.7316)	0.0212*** (2.8235)	0.0387*** (4.2015)
FIN	-0.0043 (-1.2732)	-0.0019 (-0.5680)	-0.0044 (-1.1835)	-0.0049 (-1.1223)
IS	-0.0208*** (-3.8877)	-0.0186*** (-3.0770)	-0.0228*** (-3.7720)	-0.0272*** (-3.8154)
GOV	0.0232*** (5.5720)	0.0149*** (3.4840)	0.0218*** (5.0553)	0.0294*** (6.2065)
HR	0.0064 (1.2478)	0.0083 (1.5344)	0.0072 (1.3450)	0.0018 (0.3356)
_cons	-0.2961*** (-3.3391)	-0.2075** (-2.3781)	-0.2967*** (-3.2147)	-0.4388*** (-3.9963)
N	360	312	330	270
R <sup>2</sup>	0.1881	0.1500	0.1750	0.2337

**Table 4.** Regional heterogeneity

**表 4.** 地区异质性

	(1)	(2)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G	0.0010*** (4.0772)	0.0003*** (3.2387)	-0.0002* (-1.6829)
PGDP	0.0239 (1.3177)	0.0022 (0.1241)	0.0012 (0.2843)

续表

FIN	-0.0094 (-1.4295)	0.0096** (2.2467)	0.0031 (1.4172)
IS	-0.0084 (-0.8116)	-0.0108* (-1.6664)	-0.0099* (-1.8391)
GOV	0.0764*** (7.1432)	-0.0012 (-0.1976)	0.0032 (1.3959)
HR	-0.0215 (-1.5852)	-0.0011 (-0.2184)	-0.0030 (-1.1060)
_cons	-0.1655 (-0.7736)	-0.0116 (-0.0583)	0.0200 (0.3988)
N	132	108	120
R <sup>2</sup>	0.4425	0.5107	0.3347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 5.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中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金融与 FDI 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发现：第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 FDI 增加，经缩尾处理、系统 GMM 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显著，西部地区系数为负数，促进作用未充分发挥。

### 5.2. 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构建数字金融与 FDI 良性互动机制，制定多层次便捷投融资政策，激发外资投资积极性，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与外资集聚能力[19]。

第二，明确政府与市场定位，优化营商环境。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减少不必要干预，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同时，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强化金融风险管控与纠纷化解，保障内外资企业合规发展[20]。

第三，增强数字金融集聚效应与区域创新活力，引导外资向数字创新、高新技术等领域集群发展，同时通过数字金融工具支持创新创业，构建跨区域协作网络，提升高质量外资吸引力[21]。

第四，立足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加强信息网络基建以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金融均衡发展；适度降低传统金融薄弱地区准入门槛，依托数字金融规模效应与长尾特性，促进金融资源与外资区域协调配置。

## 参考文献

- [1]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何宗樾.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8): 71-86.
- [2] 聂秀华, 江萍, 郑晓佳, 吴青.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J]. 金融研究, 2021(3): 132-150.
- [3] 杜金岷, 韦施威, 吴文洋.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吗?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6): 38-49.

- [4] 谢绚丽, 沈艳, 张皓星, 郭峰.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4): 1557-1580.
- [5] 张勋, 杨桐, 汪晨, 万广华. 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 理论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0, 36(11): 48-63.
- [6] 王修华, 赵亚雄.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J]. 金融研究, 2020(7): 114-133.
- [7] 钱海章, 陶云清, 曹松威, 曹雨阳.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6): 26-46.
- [8] 郑淦文, 叶阿忠, 孙湘湘, 吴竞超. 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3): 32-38.
- [9] 王儒奇, 陶士贵.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5): 15-26.
- [10] 刘飞飞, 李向荣. 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9): 177-180.
- [11] 曾鹏, 秦艳辉. 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49(1): 104-115.
- [12] Pástor, E. and Veronesi, P. (2009)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Stock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1451-1483. <https://doi.org/10.1257/aer.99.4.1451>
- [13]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83-499. <https://doi.org/10.1086/261763>
- [14] 王智新, 王辰筱, 朱文卿, 等.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 25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统计研究, 2023, 40(3): 71-84.
- [15] 陈永胜, 龚征旗, 王艳苹. 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 金融发展研究, 2023(1): 13-21.
- [16] 唐松, 伍旭川, 祝佳. 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 管理世界, 2020, 36(5): 52-66.
- [17] 李浩, 黄繁华. 互联网发展对 FDI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21, 37(9): 68-83.
- [18] 宋晔, 黄瑶迦, 黄磊.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22(1): 105-122.
- [19] 张蕊, 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7): 1-9.
- [20] 王刚贞, 陈梦洁.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渠道机理与异质特征[J]. 财贸研究, 2022, 33(10): 45-56.
- [21] 詹晓宁, 欧阳永福. 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 管理世界, 2018, 34(3): 78-86.